

伊朗历史教科书塑造民族认同的 历史叙事与逻辑理路^{*}

蒋 真 郭欣如

内容提要 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和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是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并分别构成了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后霍梅尼时代,为调和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之间的冲突对抗关系,伊朗历史教科书在构筑古波斯与伊斯兰双线递进文明叙事体系的同时,精心选择伊朗历史上的“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进而发掘前伊斯兰伊朗文明与什叶派伊斯兰文明共享的抵抗强权、反对专制、强调正义的连续性民族精神特质,以连贯的“抵抗叙事”弥合双重认同的紧张关系。尽管这一叙事有效地缓解了伊朗民族认同的内部撕裂,但当代伊朗历史教育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西方文明观、民族史观和宗教史观的影响,由此体现出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曲折性和长期性。

关键词 历史教科书 双重认同 抵抗叙事 民族建构

历史教育是塑造民众集体记忆、巩固身份认同、进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动员的强大纽带和建立政治团结的必要力量。”^①历史教科书作为官方历史教育中最具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载体,不仅传递着最权威的历史知识和官方历史观念,还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筛选、叙述以及暗含的价值判断,使受教育者从内心接受和内化一种具有时空连续性和内在统一性的民族历史观念。^②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研究亚非拉国家当代历史教育与民族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当代世界族裔政治、族群冲突和国家构建问题而言具有突出意义。伊朗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突出特点是两大民族认同要素的二元对抗性:源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遗产并经过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塑造的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Achaemenid-Aryan Identity),以及以伊玛目阿里家族圣裔崇拜、强调抵抗救赎思想的什叶派伊斯兰认同(Shi'i-Islamic Identity),^③二者共同构成伊朗民族认同(Iranian National Identity)的两大支柱。197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民族流散史研究”(24VLS027)之阶段成果。特别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 131.

② Amos Hofma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ducation: Values and Aims of Israeli History Curricula, 1956—1995”,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vol. 39, iss. 4, pp. 441—470.

③ 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指向的是具有原生性的、永存的,自古代时期便已高度发达的波斯—雅利安文明属性;而什叶派伊斯兰认同则指向伊朗的伊斯兰宗教文明属性,其核心是具有鲜明被压迫者和正义伸张者属性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认同(Twelve Shi'ism Identity)。

列维王朝所强调的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霍梅尼主义所强调的什叶派伊斯兰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冲突,如何内化伊朗前现代时期的民族认同资源并弥合其与现政权中伊斯兰属性之间的鸿沟,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亟需解决的难题。

当前学界有关伊朗民族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民族认同与伊朗国家建构、现代化路径选择相联结,分析民族认同所产生的影响^①;二是以民族认同为落脚点,探讨不同时期社会思潮、文化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形塑作用^②。尽管既有研究视角多元、内容丰富,对于理解伊朗民族认同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塑造公民身份认同的官方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在其间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虽还有成果聚焦伊朗教育与现代国家构建但非民族认同,且多着力于教育体系和内容的变化及影响。^③ 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构建的视角出发,结合文本分析法,以伊朗高中现行的官方历史教科书(2023年第8版)为例,^④厘清伊朗双重认同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根源,剖析伊朗历史教科书中双重认同的叙事及书写策略,进而阐释当代(1989年至今)^⑤伊朗官方历史教育塑造民族认同的逻辑理路,以深化对伊朗民族认同构建的认识。

一、自我分裂:近代伊朗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的背向运动

从20世纪初至今,伊朗官方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念先后发生三次较大变化:一是恺加王朝末期

① 代表性论著有:Mostafa Vaziri, *Iran as Imagined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3; N. R. Keddie, "Religion and Irreligion in Early Iranian Nation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 no. 3, 1962; Farideh Farhi, "Craf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Amidst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ran", in Homa Katouzian and Hossein Shahidi (eds.), *Iran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onflict*, Oxon: Routledge, 2008; 杜林泽:《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的嬗变(1925—2000)》,载《世界民族》,2024年第1期;冀开运、母仕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等。

② 代表性论著有:Alireza Asgharzadeh, *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ryanist Racism,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Updated Through 1978*,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冀开运、杨田再杰:《从语言共同体到种族主义象征——近代“雅利安”观念在欧亚大陆的流传轨迹》,载《中东研究》,2023年第1期;李福泉、李文庭:《民族认同建构视角下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散布与传播》,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冀开运、廖希玮:《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语言文学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形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2期;詹晋洁:《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等。

③ 代表性论著有:David Menashri,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Afshin Marashi, *Nationalizing Iran: Culture, Power, & The State, 1870—194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王宇洁、黄婧怡:《伊斯兰与现当代国家建构:以伊朗近现代教育改革为例》,载《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5期等。

④ 根据伊朗学科设置,三至九年级时历史无专题课程,其内容仅被涵盖在社会研究的课程之中。伊朗十至十二年级的理论高中所设置的历史课,是伊朗基础教育中最为系统的历史教育,旨在“强调历史素养的发展,巩固学生的个人和集体认同,培养中学生作为伊朗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参见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 2023年第8版,序章第1页。故高中历史教科书可以视为伊朗历史基础教育的缩影。当代伊朗的历史教科书是由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编写、设计和出版,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通常每四年修订一次。其采用章节体的记事方法,按照纵向的历史时间顺序分为《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历史:伊朗与当代世界(第三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معاصر, 3)三册。

⑤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历史观念再次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并于随后对国家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与修订,将“抵制强权势力、振兴民族”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基于此,伊朗国家最高教育委员会宣称,已对伊朗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彻底的“净化”,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宗教研究领域,清除了前专制政权的误导和颓废,以及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伊朗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教育目标也调整为,以帮助国民“更好、更准确地理解我们作为伊朗人和穆斯林在当今世界的身份和地位”。参见:G. Mehr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orld Education News and Reviews*, vol. 6, no. 1, 1992, pp. 9—16; G. Mehran, "Iran", in P. W. Cookson et al.,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Reform*, New York: Greenwood, 1990, pp. 36—37;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 第1页。

至巴列维王朝时期(1890—1971 年),伊朗西化知识精英推崇世俗的雅利安主义和波斯帝国民族主义;^①二是霍梅尼时期(1978—1989 年),官方意识形态是以否定伊朗君主制历史遗产,强调以什叶派为中心的伊斯兰历史观为核心特征;^②三是 1989 年霍梅尼去世后的共和国转型时期,官方历史观念又经历了对伊朗君主制历史遗产的重新接纳以及对雅利安—伊斯兰两大民族认同的调和。^③因此,在分析当代伊朗历史教科书的叙事策略及民族认同建构效果之前,有必要对现代伊朗双重民族认同的古代基础及其近现代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伊朗人曾先后建立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和萨珊帝国,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波斯文明。^④ 7 世纪,伊斯兰教进入伊朗高原逐渐成为伊朗人的主流宗教,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开启了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并延续至今,从而塑造了现代伊朗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伊朗认同是伊朗人对伊朗历史、土地的集体归属感,由生活在伊朗地区(Iranzamin)人民的共同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演变而来,在古代王朝政治遗产、波斯语言和文学以及伊朗宗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和什叶派)的功能性融合中得以存续。^⑤“伊朗”作为一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公元前 519 年的《贝希斯敦铭文》中,大流士一世(Darius I)称自己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之子”,^⑥表明波斯帝国统治族群具有雅利安属性。萨珊王朝(Sasanians, 224—651 年)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自我定义为“伊朗(Eran)”的政权。沙普尔一世(Shapur I)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Šāhān šāh ērān ud anērān)和“伊朗沙赫尔”(ērānšahr)等称谓^⑦,这是“伊朗”正式用于表述国家、国土和民族概念之始,标志着“伊朗”作为萨珊王朝国家认同的地域和文化符号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萨珊王朝灭亡后,伊朗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伊斯兰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伊朗”则更多作为文化地理概念延续至伊斯兰时期。16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建立后,确立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由此,伊朗的双重民族认同基础得以奠定,并一直延续至今。^⑧

实际上,前现代时期的“伊朗”认同并不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特质。但经过 19 世纪欧洲雅利安主义思潮的输出之后,伊朗世俗民族主义精英开始大力推崇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雅利安主义,将其作为伊朗文明的核心特征来加以建构。^⑨而经过西方考古学重建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及其辉煌文明,成为伊朗知识分子心目中雅利安文明的高峰。^⑩相比之下,中世纪阿拉伯人和突厥—蒙古

① Reza Zia-Ebrahimi, *The Emergence of Iranian Nationalism: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lo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7—168.

② Imam Khomeini, Hamid Algar (Trans.),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1, pp. 287—290.

③ Menahem Merhavy, “Religious Appropriation of National Symbols in Iran: Searching for Cyrus the Great”, *Irania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5, pp. 933—948.

④ 波斯帝国遗产主要包括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以及继承古代波斯帝国遗产的波斯—伊斯兰王朝帝国,如阿巴斯王朝、塞尔柱王朝、伊利汗国、帖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阿夫沙尔王朝和恺加王朝等。狭义的波斯帝国仅指阿契美尼德王朝,广义的波斯帝国可指从阿契美尼德王朝至巴列维王朝的历代统一伊朗全境,并对周边地区有强大影响力的君主制王朝国家。

⑤ Hamid Ahmadi, “Unity within Diversity: Foundations and Dynam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1, 2012, p. 5.

⑥ R. Schmitt, “BISOTUN iii, Darius’ s Inscriptions”, *Encyclopædia Iranica*, 2000.

⑦ 萨珊君主沙普尔一世在纳克什·鲁斯塔姆铭文(公元 270 年)中,明确称自己是“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Šāhān šāh ērān ud anērān)”。详见 E. Kettenhofen, *Die Römisch-Persischen Kriege des 3. Jahrhunderts n. Chr. Nach der Inschrift Šāpuhrs I. An der Ka’ be-ye Zartošt (ŠKZ)*, Beihefte Zum TAVO, Reihe B., Geisteswissenschaften, no. 55, Wiesbaden, 1982.

⑧ Richard Nelso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unich: C. H. Beck, 1983, pp. 1—6.

⑨ Reza Zia-Ebrahimi, *The Emergence of Iranian Nationalism: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location*, pp. 149—151.

⑩ 马超、黄民兴:《近代早期至 20 世纪伊朗对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发现》,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4 年第 3 期。

人的入侵,则造成了雅利安-波斯文明的大幅停滞和倒退,导致恺加王朝无力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① 故而,贬低伊朗伊斯兰传统、强调回归前伊斯兰时代的“纯正”雅利安文明,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第一批世俗民族主义精英的核心政治思想。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在伊朗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撕扯、对撞由此开始,成为理解20世纪伊朗政治史、革命史和文化史的关键维度。而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并存的张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双重困境。恺加王朝末期,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化的浪潮之下,伊朗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开始从西方引入世俗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爱国主义意识与伊斯兰宗教情感相分离,并在伊朗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反思伊斯兰认同给伊朗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突出强调与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民族、语言和历史记忆相联系的伊朗认同。在以米尔扎·法塔赫·阿洪扎德(Mirzā Fath-‘Ali Āhundzāda)和米尔扎·阿卡汗·克尔曼尼(Mirzā Āqā Khan Kermāni)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反复表露出对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厌恶,并将伊朗当前恶劣的境况与其辉煌的前伊斯兰时代进行对比。而在寻找民族衰落的根源时,他们往往将其归咎于统治阶级中腐败无能的专制君主和教士集团。在他们看来,通过净化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和拥抱西方文明以摆脱伊朗的伊斯兰历史则是寻求伊朗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② 近代伊朗第一所世俗教育机构——技术学院(Dāl al-funūn)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君主之书》(Name-ye Khosrovan)^③,就已完全使用简单的波斯语编写,而阿拉伯语单词则被彻底排除在外。^④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之下,这种淡化和贬低伊斯兰宗教认同、强调伊朗前伊斯兰身份认同的思想,逐渐在伊朗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发展到顶峰。

礼萨·汗(Reza Khan, 1925—1941年)时期,在纳粹德国有意地宣扬雅利安优等种族思想^⑤的影响下,礼萨·汗开始推行一系列雅利安化、伊朗化政策,强调前伊斯兰伊朗文明尤其是波斯帝国文明的雅利安属性以强化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伊朗的两大民族认同传统逐渐走向全面的分裂和对抗。在历史教育方面,礼萨·汗将雅利安种族主义的伊朗文明叙事完全纳入官方历史教科书之中,塑造前伊斯兰时期伊朗雅利安文明的纯洁性与高度发达,而把萨珊帝国灭亡后异族人统治伊朗高原的历史称之为“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和蒙古人入侵、伊朗文明大幅倒退的黑暗时代”^⑥。因此,在巴列维王朝的民族史学观念中,古代伊朗文明已经与现代欧洲文明具有高度一致的进步性,近代伊朗的落后完全是阿拉伯-伊斯兰因素造成的,这便为巴列维王朝大力复兴阿契美尼德帝国遗产、为波斯帝国“招魂”的政治宣传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巴列维时代伊朗政治精英推崇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三大帝国,其中特别专崇阿契美尼德帝国,^⑦而伊斯兰之后的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

① Masoomeh Shakoor Ghahari, Mohammad Ali Akbari, “Accounts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in First Pahlavi Era of the Iranian Comm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Biology*, vol. 8, no. 11, 2014, p. 831.

② Juan Cole, “Marking Boundaries, Marking Time: The Iranian Pa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by Qajar Thinkers”, *Iranian Studies*, vol. 29, no. 1-2, 1996, pp. 35-56.

③ 伊朗官方使用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由法特赫·阿里·沙赫的第55个儿子贾拉勒丁·米尔扎(Jalal al-Din Mirza)所编写,讲述了包含萨珊帝国在内的伊朗古代历史,对伊朗民族史学的重建具有开创性意义。

④ [伊朗]阿巴斯·阿玛纳特(عباس امانت):《国王的钱币与伊朗民族历史观念的复兴》(پولهاکان و احیای اندیشه تاریخ ملی ایران),载《伊朗杂志》(مجله ایران),1999年冬季第9卷,17/1,第17页。

⑤ 雅利安人是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自称,最早见于《阿维斯塔》和《梨俱吠陀》。18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之间存在共同祖先——原始印欧语。19世纪之后,白人种族主义者歪曲利用古代印度-伊朗文献中的雅利安认同,将雅利安人的概念泛化并抽象为所有印欧语系白种民族的共同祖先人群,形成白种人=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

⑥ Afshin Marashi, *Nationalizing Iran: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1870-1940*,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p. 99-100.

⑦ Masoomeh Shakoor Ghahari, Mohammad Ali Akbari, “Accounts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in First Pahlavi Era of the Iranian Comm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Biology*, vol. 8, no. 11, 2014, pp. 829-830.

服时代的王朝帝国、直到恺加王朝被认为是异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在巴列维精英的历史观念中,阿契美尼德辉煌—阿拉伯伊斯兰黑暗—突厥蒙古黑暗—巴列维重新复兴阿契美尼德辉煌构成了一条类似琐罗亚斯德教初际光明—中际善恶斗争—末际光明最终再次胜利的历史图景,由此将阿契美尼德帝国遗产与巴列维政权的合法性深度绑定在一起。

礼萨·汗的继任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上台后,进一步推动雅利安化、伊朗化政策,甚至采用“雅利安之光(Aryanmehr)”作为自己的称号。巴列维国王发起名为“白色革命”的西方化改革,将伊朗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阿拉伯—伊斯兰观念推到高潮。在巴列维王朝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什叶派乌莱玛的教育垄断权被打破,削弱了穆斯林通过经学院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能力。^①加之什叶派宗教人士的司法权和经济基础的丧失,伊斯兰彻底被边缘化并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大批倡导波斯帝国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巴列维政权的扶植下诞生。这些政党组织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为指向,主张抵御泛突厥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冲击,强调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②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精英通过构建前伊斯兰时代伊朗文明高度发达的叙事,为伊朗古代文明赋予了与西方现代文明同源的现代性与进步性,从而形成雅利安进步—伊斯兰倒退的二元对立史观。随着巴列维政府主导的 1971 年“庆祝古波斯帝国成立 2500 周年庆典”的召开,对雅利安人和波斯帝国文明优越性的认同观念达到顶峰,同时也造成了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的割裂与高度紧张关系。然而,巴列维国王对激进的波斯帝国—雅利安种族文明认同的强调以及对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文明传统的排斥和压制,造成了伊朗民族认同的深刻危机。^③由于巴列维王朝打造的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包含鲜明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观色彩,使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朗什叶派宗教精英对伊朗君主制传统深恶痛绝。^④

总体而言,20 世纪以来,伊朗世俗知识精英主张将伊朗的落后归咎于伊斯兰教的蒙昧和保守,而将进步的希望寄托于恢复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⑤通过雅利安认同振兴伊朗民族文化。而捍卫什叶派伊斯兰认同的宗教人士则认为,近代伊朗的落后是因为巴列维王朝的“西化病(Gharbzadeghi)”^⑥和种族主义,要进步则需要回归纯正的伊斯兰。^⑦近代伊朗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的背向运动,实际上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伊朗民族认同发生自我分裂的结果。尽管如此,巴列维时代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尊崇为伊朗前伊斯兰文明所赋予的雅利安种族文明属性,仍对现行伊朗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伊朗文明叙事产生深远影响。如教科书第一册《伊朗与古代世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45.

②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Updated Through 1978*, pp. 286–311.

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āzargān)在巴列维国王倒台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关键过渡期的讲话中指出,“用伊斯兰教来反对伊朗民族主义,就等于自我毁灭。否认伊朗认同、认为民族主义是反宗教的,是反伊朗运动的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Houchang E. Chehabi, *Irani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Iran under the Shah and Khomeini*, Ithaca: NCROL, 1990, p. 243.

④ Imam Khomeini, Hamid Algar (Trans.),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p. 201.

⑤ Alireza Asgharzadeh, *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ryanist Racism,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pp. 90–92.

⑥ “西化病”(波斯语:غربزدگی),该词最早于 20 世纪 40 年代由伊朗哲学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法迪德(Seyyed Ahmad Fardid)提出,用以指称古希腊哲学的霸权。1962 年赛义德·贾拉勒·艾哈迈德(Seyyed Jalāl al-e-Ahmad)出版《西化病:来自西方的瘟疫》一书后,该词得以推广,其以“西化病”攻击世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无法有效地建构真正的伊朗现代性。艾哈迈德认为,为了避免现代性的同质化和异化,必须回归伊斯兰文化的根源。即试图用伊朗伊斯兰传统来重新建构现代性。(参见 Ali Mirsepassi,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Negotiating Modernity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6.)

⑦ Ali Shari'ati, Hamid Algar (trans.), *On the Sociology of Islam: Lectures by Ali Shari'ati*, Berkeley: Mizan Press, 1979, p. 16; Imam Khomeini, Hamid Algar (Trans.),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p. 28.

界》中“雅利安”一词共出现了21次,均指向前伊斯兰时期伊朗的民族特征与帝国文明属性。由此可见,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和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早已共同构成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两大核心元素,二者缺一不可。无论是巴列维时期对伊朗伊斯兰传统的拒斥,还是霍梅尼时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伊朗君主制传统的全盘否定,都只会加剧现代伊朗民族的二元认同困境。因此,构建一个既能包含什叶派伊斯兰教认同又能涵盖伊朗前伊斯兰雅利安文明属性的历史叙事成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历史教育关注的焦点。而如何处理萨珊王朝的灭亡、早期伊斯兰时代伊朗的伊斯兰化、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以及中世纪阿拉伯人、突厥—蒙古人对伊朗的异族征服,是考验教科书历史叙事能力和民族认同构建智慧的重点环节。

二、并行不悖:伊朗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叙事及其内在缺陷

伊朗历史教科书叙事体系的一大特点,是同时包含前伊斯兰伊朗文明和波斯—伊斯兰文明两大叙事体系。第一册所重点讲述的古代波斯辉煌的帝国文明与第二册以伊斯兰文明和什叶派阿里家族为主线的双重叙事,共同构成了前现代伊朗文明史的完整序列。在这一叙事体系中,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处于并存关系,充分体现出对巴列维时代雅利安主义和霍梅尼伊斯兰主义思想遗产的综合与调适。伊朗历史教科书体现出的双重认同特征,与伊朗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伊朗现政权的国家构建需求密切相关。在两种身份认同观念中,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贯穿其整个历史进程,什叶派伊斯兰认同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的一种宗教身份认同。因此,尽可能多地利用兼具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的因素,打造相互依存的雅利安—伊斯兰双重文明认同观,成为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的主要叙事策略。

首先,伊朗历史教科书仍然强调雅利安认同,将雅利安人的到来作为古代伊朗文明的开端。编写者有意突出雅利安伊朗文明在古代西亚早期文明中的地位,强调雅利安文明的高起点及其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继承权。教科书叙述从伊朗文明兴起到伊斯兰到来之前的伊朗历史时,始终注意突出对古代伊朗—雅利安文明的古老性、优越性和连续性进行正面叙述。教科书将伊朗文明的早期阶段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挂钩,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包括伊朗高原以西的所有低地”“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伊朗文明也深受该文明遗产的影响”。^①同时,高度评价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和萨珊帝国的历史地位,分别赋予它们文明奠基者、捍卫者和复兴者的身份,从而构筑伊朗文明的连续性叙事。教科书称阿契美尼德帝国“给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使伊朗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民族”;而安息人“弘扬了伊朗主义,复兴了伊朗”;萨珊王朝的“科学文化进步远超先前,影响深远”。^②这些表述,有助于增强伊朗民众对古代伊朗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此外,教科书还歌颂安息王朝抵抗塞琉古和罗马的胜利战争,以突出安息王朝的伊朗民族属性及其对伊朗国土、文化和价值观的捍卫。对于亚历山大、塞琉古和帕提亚时期的希腊化则轻描淡写,否认希腊文化对伊朗文明的影响深度,从而强调伊朗古代文明的顽强性和延续性。

其次,教科书在纪年方式、概念使用上体现雅利安—伊斯兰两大认同的共生性。在教科书的纪

①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۱),第35—38页。伊朗教科书认为所谓“历史时期(之前是史前时期)”,是以线形文字书写系统的出现为标志。

②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۱),第84页、第89页、第94页、第141页。

年方式中,历史事件具体时间的书写仍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法,但序言的历史大事年表和时间轴旁边,通常会配以相对应的伊斯兰历^①阴历纪年。而在谈及一些特殊事件时又会穿插伊朗公历纪年法,如关于“波斯湾国庆日”的论述,“阿巴斯一世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波斯湾,解放了伊朗海岸和波斯湾岛屿。这件事发生在伊朗公历 1001 年 2 月 10 日(1622 年 4 月 30 日),因此这一天在伊朗历中被命名为“波斯湾国庆日”^②。在概念使用上,教科书将伊斯兰教进入前后的伊斯兰历史进行了明显区分,进入伊朗高原后的伊斯兰教均被加以“伊朗的”这一含义鲜明的形容词,直接以“伊朗的伊斯兰教”“伊朗伊斯兰文明的扩张”等作为课目名称,由此体现出教科书将波斯帝国-雅利安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进行融合涵化的鲜明叙事意图。

再次,在处理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文明与伊斯兰时代之后的文明关系时,努力呈现伊朗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鉴涵化。一是,描述波斯帝国-雅利安文明遗产对伊斯兰文明的塑造作用。尽管教科书对萨珊王朝末期的社会不公有所批判,但仍承认“萨珊王朝灭亡、伊斯兰教传入伊朗后,伊斯兰艺术受到萨珊艺术的重大影响”^③。二是,通过对比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前后的伊斯兰文明,彰显伊朗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贡献。教科书称,在穆斯林征服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虽与伊朗、罗马这些伟大而文明的国家关系密切,并有贸易关系,但在文化和文明方面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连最重要的城市麦加的识字人数也屈指可数”。而穆斯林征服后,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使伊朗这一有着丰富文化和文明的地区的民众成为了穆斯林”“通过逐渐接受伊斯兰教,伊朗人在伊斯兰文化和文明的建立、扩张与繁荣中发挥巨大作用”。此外,教科书认为阿拉伯帝国也是“通过适应萨珊王朝的迪万制度(Divān),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序且连贯的行政组织”。在此之前,“伊斯兰政府的行政和财政组织十分简单”。三是,将阿拔斯王朝分为繁盛期和衰落期两个阶段,暗示从政的伊朗人能够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在繁盛期“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一起在阿拔斯政府中享有特权地位,并在管理哈里发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重点刻画了伊朗巴尔马克家族(Barmakids)和萨赫勒家族(Sahl)的地位变迁。然而,“马蒙(al-Ma'mūn)之后的阿拉伯统治者剥夺了伊朗官员的政治权力,伊朗人地位迅速下降,导致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这种叙事将伊朗人地位的变迁与阿拉伯帝国的兴衰绑定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人对伊斯兰文明的贡献,体现出鲜明的双重认同叙事主旨。

另外,从全球史的视域阐述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伊朗文明对世界文明同时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教科书巩固伊朗双重身份认同的又一策略。如在描述伊朗的地理位置时,强调“伊朗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伊朗人在传播和拓展文明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谈及中国古代所开辟的丝绸之路时,将其看作是“通过伊朗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的道路”;在讲述罗马的社会生活时,指出“一些古代伊朗信仰西传至罗马境内(指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崇拜),对罗马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及萨珊君主“为因罗马皇帝的宗教迫害政策而避难到伊朗的希腊哲学家提供了庇护”;在描绘伊朗古代的农业技术和建筑艺术时,认为“开凿坎儿井技术是从伊朗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伊朗的园艺风格不仅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模仿,还从东边的北印度渗透到西边的北非,并传入欧洲”^④。通过将伊朗塑造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和必经之地,并选取伊朗宗

① 伊斯兰历是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由麦加迁往麦地那的事件作为元年,为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所通用。

②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024 年第 8 版,第 140 页。

③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第 149 页。

④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第 48 页、第 58 页、第 142 页、第 119 页、第 144 页。

教文明、技术文明向外广泛传播以及外来文明在伊朗帝国境内获得庇护和发展的案例,教科书基本呈现了古代伊朗文明开放包容的正面形象,从而有助于实现其提升伊朗民族自信、巩固伊朗民族认同的目标。

最后,教科书重点突出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在伊朗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成功实现了伊朗什叶派认同的民族化叙事,并为乌莱玛在伊朗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做好了充分的叙事铺垫,从而打造什叶派伊斯兰教与伊朗伊斯兰文明的互构性叙事。萨法维王朝是伊朗人什叶派认同观念形成的关键期,^①奠定了此后伊朗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基础。因而,对萨法维政权的肯定便构成了伊朗教科书的重要内容。在教科书的叙述话语中,萨法维政府的建立被认为“是伊朗历史上非常重要和决定性的事件,它成功地在政治、地理和社会上统一了伊朗,使什叶派宗教合法化并创造了经济繁荣”。在萨法维政府治下,“什叶派穆斯林变得有组织、一致和团结,伊朗与其穆斯林邻国,特别是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得以明显区分开来”^②。而萨法维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也被予以赞美之词,如“萨法维时代的巴扎是世界上最热闹、最美丽的商品交换场所之一”“伊朗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伊朗纺织业在萨法维时期进入黄金时代并发展为民族工业”^③等。萨法维王朝在教科书的历史书写中是近代伊朗最强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官方的什叶派信仰有力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和明确身份边界的伊朗国家,从而凸显了萨法维时期什叶派伊斯兰教与伊朗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同构共生关系。

然而,当代伊朗历史教科书中呈现的“双重认同”叙事,仍存在许多未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其一,在描绘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双线并行的同时,力图通过一种入侵和复兴交替的民族主义叙事逻辑,强调在外族入侵时伊朗文化的持续生存,而这也构成了伊朗身份认同的核心。由此衍生出了以下逻辑链条:伊朗民族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其内在的吸引力战胜了入侵者并使其伊朗化。这一叙事造就了一种永恒存续、一成不变的单线民族史观,忽略了伊朗历史上多元族群融合的复杂性。其二,教科书对伊朗伊斯兰化进程的单一化解释,强调伊斯兰教的公正平等是吸引伊朗人改宗的主要因素,忽略了琐罗亚斯德教传统对伊朗伊斯兰教乃至伊朗什叶派的塑造作用,^④这导致伊斯兰前后伊朗文明认同延续性叙事存在缺陷;其三,教科书过分强调伊朗双重身份认同的并行不悖,而回避了伊朗文明和伊朗民族历史演进的多元性。雅利安种族中心主义的潜在意识仍然根深蒂固,而将波斯文明等同于伊朗文明的叙事,导致非伊朗族群和历史中中亚伊朗人历史贡献的缺失、伊朗族群边界的固化和少数族群历史地位的失语。其四,教科书中的抵抗—同化—复兴周期性叙事刻画了伊朗文明缺乏包容弹性的刻板印象。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中心的伊朗现代史叙事将什叶派宗教人士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力量排除在外,君主制和世俗民族主义精英在伊朗现

① Roy S. Fischel, “Shi’i Rulers, Safavid Alliance and the Religio-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Deccan”, in Charles Melville (eds.), *Safavid Persia in the Age of Empires: The Idea of Iran (Volume X)*,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21, p. 331.

②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第135页、第137页。

③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第144页、第155页。

④ 琐罗亚斯德教与什叶派在宗教哲学思想和仪式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如什叶派中的伊玛目侯赛因受难表演(Ta’ ziyeh),与前伊斯兰时期波斯人纪念被图兰人杀害的王子夏沃什(Siyawush)的仪式极为相似,可见前者对后者的吸收借鉴。详见 Maryam Nemat Tavousi, “Siyāvoš as a Vegetation Deity”, *Iranian Studies*, vol. 41, no. 2, 2008, pp. 173–182; William O. Beeman, “Martyrdom, Shi’a Islam, Ta’ ziyeh: Political Symbolism in Shi’a Islam,” in Meir Litvak (eds.), *Martyrdom and Sacrifice in Islam: Theolog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London: I. B. Tauris, 2017, pp. 224–243.

代化进程的贡献被抹杀。^①

总之,历史教科书中伊朗身份认同的排他性、种族化叙事,未能充分反映伊朗历史进程中文明交往的复杂性和现代伊朗民族格局的多元性,因而其教育宗旨在巩固伊朗国家认同的功能上仍然存在体系性的缺失。

三、以负面他者反衬内部自我:当代伊朗历史教育对民族抵抗特性的建构

尽管当代伊朗历史教科书在充分汲取巴列维王朝波斯帝国—雅利安民族主义和霍梅尼伊斯兰主义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构筑了一套从古代伊朗—雅利安文明兴起、波斯诸帝国相继推动文明发展、伊斯兰教与波斯文明相互涵化,以及乌莱玛阶层领导民众建立伊朗现代国家的连续性民族史叙事,致力于打造“双重认同”的并行不悖。但这一叙事并非完美无缺,且在许多方面体现出的是两大民族认同的并立而非融合关系。由于难以找到“雅利安性”和“伊斯兰性”之间的共通点,塑造跨越不同时期的外部帝国主义和内部专制主义,便成为教科书建构伊朗民族身份的永恒抵抗特性、缓和“雅利安”与“伊斯兰”之间紧张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伊朗民族抵抗特性的形成,与长期被外族征服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经验有关,^②也与琐罗亚斯德教—什叶派的救赎思想相合,^③更因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霍梅尼主义的反帝反殖特性而进一步强化,^④遂成为历史教科书塑造伊朗民族认同的主要向度。

“他者”是帮助确立和巩固“自我”身份的重要参照物。在教科书构筑的叙事体系中,只要是反抗外部和内部他者,弘扬“抵抗精神”和伊斯兰正义、公平和民主价值观的,无论哪一历史时期,抑或是上层政权、下层民众、宗教阶层还是世俗力量,只要反抗外国侵略或本国专制主义,皆为教科书的正面歌颂对象。而伊朗民族“抵抗”特性的“担纲者”,在近现代时期的历史叙事中,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什叶派乌莱玛身上,这就赋予了什叶派伊斯兰认同以强大的内在合法性。通过这一叙事策略,当代伊朗历史教科书在双重认同叙事的基础上,通过他者压迫和自我抵抗的叙事逻辑,将整个伊朗文明史都塑造成了一部具有鲜明“抵抗”色彩,且完全符合伊斯兰共和国核心价值观的伊朗民族史。

(一) 残暴专制的“亚述他者”与开明宽容的“波斯自我”

教科书有意识地选择伊朗历史中的“他者”来反衬和强化雅利安伊朗文明的高贵优越属性,从而塑造出了一种伊朗文明更为卓著的形象。在有关外族统治伊朗高原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亚述帝国的专制统治,还是塞琉古王朝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抑或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进入伊朗,还是蒙古人的野蛮征服^⑤,都无法破坏伊朗自身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和种族纯洁性,且都分别得到了波斯帝国宽容主义、安息帝国抵抗主义和波斯地方王朝民族主义的“抵抗性”修正。在古代一册的教科书中,例举了亚历山大东征期间伊朗将军阿里亚巴扎内斯(Ariabarzanes, Aryan Burzan)抵抗马其顿军队以死报国的著名事迹。教科书提及了塞琉古时期马其顿人所推行的诸多希腊化政策,但同

① 穆宏燕:《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反思伊朗伊斯兰革命》,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

② 范鸿达:《从伊朗的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性》,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1 期。

③ Said Amir Arjomand, *Revolutions of the End of Time: Apocalypse,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3, pp. 183–195.

④ Imam Khomeini, Hamid Algar (Trans.),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1980)*, pp. 193–201.

⑤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第 87 页。

时也指出:“他们的绝大多数努力都是无效的,伊朗境内的希腊文化无法在伊朗传播和产生深刻的影响。”^①在描述安息帝国的部分,教科书称安息人是从里海东边崛起的伊朗部落,“他们凭借勇气和战斗精神,将伊朗从外国人手中夺回,通过融合伊朗文化的不同元素,弘扬伊朗主义,甚至将分散在其境内的希腊人也一并团结在一起,逐渐恢复了伊朗的独立和尊严”^②。此类描述着重凸显伊朗文明优越性的一面。这种负面他者与正面自我对照的叙事策略,在教科书所选择的“史料分析”课后习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书中截取了两段君主治国理政的史料,其中一段描写亚述帝国君主阿舒尔巴尼拔在进入埃兰之后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故事,另一段则叙述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国君主居鲁士解放巴比伦并获得巴比伦人爱戴的历史。随后,教材要求学生将阿舒尔巴尼拔和居鲁士进行比较。这些高下立判的史料案例和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引导性提问,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古代伊朗文明的赞赏与认同。教科书采用这种宽容开明的“波斯自我”与专制残暴的“亚述他者”的对比叙事,有效地回避了巴列维时代推崇波斯帝国民族主义对伊朗君主制传统造成的负面印象,重新实现了波斯帝国遗产在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化和正面化。

(二) 专制等级主义的“萨珊他者”与公平正义的“马兹达克-伊斯兰自我”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和萨珊王朝的灭亡无疑是古代伊朗历史最大的转折点,而萨珊王朝这一“最后的雅利安人伊朗帝国”的灭亡、伊朗人放弃琐罗亚斯德教接受伊斯兰教两大事实,本身极易导致伊朗人对外族统治的仇恨心理,以及伊朗被迫接受征服者宗教信仰的痛苦纠结情绪。因此,如何在前伊斯兰时期雅利安伊朗文明的辉煌和伊斯兰时期伊朗文明的延续更新之间,建立历史逻辑与民族情感的自治关系,是伊朗历史教科书叙事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教科书基本放弃了阿拉伯征服史观,将萨珊王朝的灭亡归因于古代伊朗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固有缺陷。通过将萨珊专制主义塑造为“内部他者”,教科书便为伊斯兰教的兴起及伊朗的伊斯兰化铺垫了一种拯救论叙事,并以之替代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带来的屈辱历史记忆。教科书强调萨珊王朝晚期内外交困的时代特征,尤侧重叙述其内部不可调和的政治经济矛盾,旨在为伊斯兰教进入伊朗提供历史依据。此外,教科书有关晚期萨珊王朝政治的正面论述大幅缩减,转而重点强调库思老一世(Khosrow I, 531—579年)收效甚微的社会改革与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残酷争霸战争共同导致了萨珊王朝的衰亡。然而,教科书却两次提及该时期象征追求平等正义的马兹达克运动,同时专辟条目分析萨珊王朝衰落和崩溃的原因。其中,尤其强调萨珊末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以及民众对萨珊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为伊朗民众接受伊斯兰教,并随之开启伊斯兰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叙事。在其叙事逻辑中,“伊斯兰教是呼吁团结、平等和兄弟情谊的”^③。而面对萨珊末期伊朗社会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不公正现象,平等正义的伊斯兰教对于古代伊朗文明的延续而言,具有神圣的“拯救”意涵。由此,教科书将伊斯兰教这一源自阿拉伯人的“外来宗教”,顺势描绘成了在萨珊王朝晚期的不公正时代横空出世拯救伊朗文明的历史力量,从而成功打造了伊斯兰教在伊朗民族历史中的本土化正面叙事。这一叙事策略,完全符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用正确的话语来抵抗,它就必须利用历史。它应该利用伊斯兰教的

①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第91页,第134页。

②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第94页。

③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古代世界(第一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باستان, 1),第98页。

历史,看看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过去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榜样”^①。由此,伊斯兰认同便被塑造为对照晚期萨珊王朝专制主义和等级属性这一“内部他者”的“正面自我”,获得了进入伊朗民族“神圣抵抗”历史主线的合法性。

(三) 背离正道的“逊尼派他者”与奋勇抗争的“什叶派自我”

历史教科书通过大量叙述阿里家族受到先知青睐却在后来反遭不公正待遇的经历,将伊朗受教育者的情感从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痛苦情绪巧妙转移至对阿里家族继承权和什叶派信仰的同情与认同上,并从什叶派的视角赋予了伊朗民族重振和恢复伊斯兰早期先知家族纯洁信仰的正义使命感。针对这一复杂敏感的历史时期,教科书采用多线交织的叙事模式,在将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历史详尽叙述的同时,对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的兴起与发展历史进行具体描绘,重点突出什叶派认同。

其一,强调伊玛目阿里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密切关系及其为先知钦定继承人的正统身份。在教科书的叙事中,阿里是在希吉拉(迁徙)之后被先知穆罕默德选定为兄弟的人,并在随后辅助穆罕默德布道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真主的使者(即穆罕默德)委托阿里前往麦加宣讲《忏悔章》,以根除半岛的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②。关于先知继承人问题,一直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可调和的矛盾,教科书强调阿里的继任者身份由先知授予,“回历十年,先知穆罕默德与大批穆斯林一起举行了辞朝仪式。在返回麦地那途中,先知在布道时传达了他最重要的遗愿,即宣布伊玛目阿里作为他的继任者,并宣布《古兰经》的启示结束”,至于艾布伯克尔等正统哈里发的继任,则是“穆斯林以理性的方式捍卫信仰,避免因继承分歧造成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③。而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偏离伊斯兰正义的政治统治期间,“阿里试图通过遵循伊斯兰教义和真主使者的圣行来恢复伊斯兰世界的兄弟情谊和宗教团结”^④。此类叙述,显然是站在维护什叶派正统合法性的立场上,批判正统哈里发逐渐偏离早期伊斯兰教的“正道”,从而为阿里家族的正统性张目。

其二,有意塑造逊尼派哈里发背离伊斯兰正统和什叶派伊玛目坚守伊斯兰正统的两种对立形象,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伊朗受教育者对什叶派伊斯兰历史观念的认同。教科书对什叶派在维护社会平等与正义方面的功用多所着笔,将倭马亚王朝视为“背离《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先知所强调的道德原则与价值观”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君主制”王朝,并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倭马亚王朝的非正义统治、社会起义和抵抗运动,谴责其对阿里追随者的迫害。反之,极力赞扬该王朝的第八任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Umar bin Abd al-Aziz)禁止咒骂和侮辱阿里的行为,认为尽管其统治时间极短,但“留下了美名”^⑤。同时,教科书单列条目讲述伊玛目侯赛因为维护伊斯兰正义而殉难的故事,并评价伊玛目侯赛因及其同伴在卡尔巴拉的殉难,“不仅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是一

① 教科书引用霍梅尼的话语作为开篇。详见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۲),封面。

②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۲),第34页、第39页。

③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۲),第39页、第42页。

④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۲),第46页。

⑤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۲),第53—59页。

场巨大的灾难和决定性的事件,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如此。伊玛目侯赛因制止了削弱和摧毁伊斯兰教的进程,并为此后的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激励了后世宗教领袖们为复兴纯粹的伊斯兰教而奋斗”^①。这种宣扬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殉道精神的话语,构成了伊朗人不畏强权、顽强抵抗的精神来源。

此外,教科书通过着力渲染和歌颂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地方民众起义、阿拉伯帝国后期的伊朗独立王朝以及突厥-蒙古时期伊朗伊斯兰文明对异族统治者的同化,来说明伊朗“抵抗性”民族精神的连续性及其与伊斯兰认同的互构性。第一,在叙述阿拉伯帝国的地方民众起义时,强调起义的伊朗民族属性,并将起义领袖的精神特质与什叶派信仰相结合,如因纪念阿布·穆斯林而举行的地方起义。针对上述运动的评价,教科书指出其“虽然惨遭镇压,但削弱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对伊朗东部地区特别是呼罗珊地区的统治,为这些地区的伊朗王朝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②。第二,对于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著名学者多强调其伊朗族裔身份,从而巩固雅利安-伊斯兰双重认同。如“纵观伊斯兰文明领域的科学史,伊朗学者和思想家是许多不同领域科学的先驱”^③。第三,在书写塞尔柱至帖木儿时期,重点描绘伊朗宰相、科学家和史学家等对伊朗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尤其是伊朗民族诗人菲尔多西(Ferdowsi)和历史名相尼扎姆·莫尔克(Nizām al-Mulk)。同时,教科书还有意选取伊斯兰时期的著名学者画像、著作封面和建筑图像,从而为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高度成就提供与文字相搭配的直观材料。第四,将萨法维王朝叙述为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高峰阶段,^④这一时期,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贡献与萨法维君主的开放宽容相互补充,造就了近代早期伊朗的繁荣昌盛。第五,谴责巴列维政权试图“人为地制造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对比”^⑤的行为,言下之意表明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二者之间本身就是相辅相生的。

(四) 西化病浸染的恺加-巴列维“专制他者”与追求正义民主的“什叶派自我”

对19世纪后的内容书写中,教科书进一步宣扬什叶派宗教学者在伊朗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反帝反殖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强调乌莱玛阶层在这一时期伊朗改革史、革命史和思想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为现代伊朗民族国家赋予鲜明的什叶派伊斯兰色彩。

教科书始终强调什叶派乌莱玛在伊朗现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治参与及坚定地维护正义和爱国立场,将现代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与什叶派认同深度结合在一起。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是伊朗由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关键一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则是伊朗现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教科书在评价烟草抗议运动时,认为它“揭示了什叶派乌莱玛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和领导地位,并显示了内部暴政和外国殖民主义在对抗什叶派时的脆弱性”。它将随后爆发的立宪革命称作是“由乌莱玛领导的巨大运动”,并称在议会建立之前“他们一直在努力为国家建立正义”,

①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第61页。

②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第71页。

③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第92页。

④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从穆罕默德的使命到萨法维王朝的终结(第二册)》(تاریخ: از بعثت پیامبر اسلام تا پایان صفویه, 2),第135页。

⑤ 伊朗教育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当代世界(第三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معاصر, 3),第132页。

而小专制时期的到来则是“立宪革命后期偏离伊斯兰的合法道路”的结果,这显然是站在什叶派和伊斯兰道路才能更好地领导革命的立场上书写伊朗反殖民压迫的历史。同时,还为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人民“参加和平示威,高呼巴列维政府垮台,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笔。^①

此外,教科书还将伊朗人民保卫国土、反击萨达姆侵略的两伊战争(1980—1988 年)赋予“神圣防御”的属性,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共和国与历史上伊朗各抵抗主体一脉相承的“抵抗自我”形象。教科书将两伊战争看作是伊朗现代史上最重要、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件之一,它将其定义为“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伊朗人民抵御外来侵略者的神圣保卫战”^②。在这场战争中,“尽管许多国家支持萨达姆,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一心一意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块土地丢失”“英雄的伊朗人民在八年的神圣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通过将两伊战争塑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伊朗民族奋勇牺牲捍卫祖国的神圣防御战争,历史教科书成功地呈现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与现代伊朗民族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教科书编写者通过这一对“伊朗自我”抵抗“伊拉克他者”的历史叙事,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与伊朗民族抵抗外部强权和内部专制的“神圣民族历史”成功融合为一体。

综上所述,教科书对于伊朗历史上“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的塑造,具有明显的选择性、针对性和建构性,均服务于构筑伊朗民族认同中的“抵抗特质”。通过对专制主义、帝国主义他者的塑造,教科书赋予了不同历史时期伊朗文明鲜明的反对强权、专制、追求公平正义的抵抗属性,其具体对照关系可见表 1:

表 1 伊朗历史教科书中“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的对照关系

历史时期	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	代表伊朗民族认同的抵抗主体
前伊斯兰时期	亚述帝国的残暴专制(外部)	波斯帝国的开明宽容
	亚历山大的帝国主义(外部)	阿里亚巴扎内斯的英勇抵抗
	罗马帝国的扩张主义(外部)	安息王朝的民族抗争
伊斯兰前后	萨珊帝国的专制主义(内部)	马兹达克和伊斯兰教的公平正义
伊斯兰时期	倭马亚王朝的君主专制(内部)	阿里家族的仁爱牺牲精神 阿布·穆斯林的反抗精神
	恺加-巴列维王朝的专制与西化病(内部)	什叶派乌莱玛的反抗精神
现当代时期	萨达姆、以色列及美国的帝国主义(外部)	伊斯兰共和国的抵抗精神

作者自制。

①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当代世界(第三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معاصر, ۳),第 62 页、第 64 页、第 70 页、第 139 页。

②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当代世界(第三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معاصر, ۳),第 153 页。

③ 伊朗教育研究与规划组织(سازمان پژوهش و برنامه‌ریزی آموزشی)编:《历史:伊朗与当代世界(第三册)》(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جهان معاصر, ۳),第 161 页。

以上七对具有压迫—专制属性的“他者”与作为抵抗主体的“自我”的对举,将贯穿伊斯兰前后伊朗文明的连续性“抵抗”特质跃然纸上,继而有效弥合了雅利安认同与伊斯兰认同之间的张力,无疑有助于受教育者加强对什叶派伊斯兰教“抵抗精神”的民族认同内化。教科书通过把伊朗民族性建基于贯穿古今的抵抗叙事之上,将抵抗性构筑为伊朗民族认同的核心属性,从而打通了前伊斯兰伊朗文明与伊朗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巩固和融合现代伊朗民族双重认同的教育目的。

四、结 语

历史教育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充分体现了后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共和国对于伊朗两大文明传统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从历史教材编排体例、内容分布和核心思想来看,当代伊朗历史教育着重强调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的连续性以及什叶派伊斯兰认同与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之间的互补性。悠久的伊朗古代文明史和稳定的什叶派宗教身份,使得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构成伊朗人身份认同的两大组成要素。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在汲取巴列维王朝覆灭教训的同时,充分结合伊斯兰共和国官方意识形态的现实需求,通过在历史教科书中构建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并行的双重认同范式来建构伊朗现代民族认同。通过调整纪年方式和伊朗—伊斯兰文明的融合性概念使用,教科书着力强调伊朗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共生性与互补性。而通过系统选择塑造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以反衬不同时期伊朗历史主体的抵抗特性,则是教科书弥合两种认同、构建连续性伊朗民族史叙事的重要书写策略。正如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 Black)所言,现代民族国家高度依赖其公民的认同与协作,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语言符号作为核心民族性要素则为民族国家获得支持提供了必要基础。^① 伊朗官方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历史事件和行为主体的重新建构与诠释,为国家全体公民塑造了一种统一性的身份认同。

但是,伊朗历史教科书叙事中对伊朗多元民族国家属性的忽视,也为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埋下一定的隐患。除了双重认同和抵抗叙事之外,伊朗教科书所强调的历史观念和叙事体系还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线性民族史观,这一观念强调民族的种族纯洁性,排斥非波斯民族和文化的影响,树立了一种排他性的波斯文化优越感,忽视非波斯族群对伊朗文明的贡献,这并不利于伊朗民族认同历史资源的多元整合。第二,什叶派中心史观,仍然强调伊斯兰教优于前伊斯兰伊朗宗教,什叶派优于逊尼派,教士阶层比君主制度更进步,缺乏政教共生叙事,忽视世俗知识分子对于伊朗现代性的贡献,故并未完全摆脱两种传统的冲突模式;第三,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教科书对于波斯文明的兴衰叙事,采用的是种族主义崛起论、君主专制衰亡论和伊斯兰文明拯救论。这一叙事将国家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特定的种族和民族,以及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支持牵强地联系起来,缺乏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的论述,因此仍未摆脱宗教史观和神学史观的窠臼。

由于当今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权结构以及对外政策中的泛伊斯兰主义盛行,伊朗民族身份认同中的伊斯兰属性似乎完全压倒了雅利安属性。但从当代伊朗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模式来看,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仍然顽强地存在并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教育中,雅利安认同并没有因为伊斯兰认同的主导地位而遭到忽视,而是呈现出与伊斯兰认同并驾齐驱的特征。这表明当代伊朗并没有因为伊斯兰革命而彻底抛弃君主制时代的民族认同遗产,而是将

^① Cyril Edwin Black,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of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13–15.

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共同作为伊朗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加以宣扬。这种“借助共同的辉煌过去来塑造集体认同和再度实现辉煌”也成为中东国家构建身份认同的普遍性特征。文明遗产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遗迹,还是现代国家认同的“根基性想象”。^① 尽管如此,当代伊朗政治稳定的表象下仍然潜伏着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究其原因,仍与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两种民族认同遗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密切相关。尽管在伊朗现行历史教科书中两种认同均得以强调,但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始终未能得到清晰的阐释。教科书所构筑的伊朗民族主体抵抗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的连续性叙事,在许多层面并不十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受教育者出现“对帝国成就知之甚少,而当谈到负面的历史记忆时却能例举颇多”的现象,^② 这显然有违官方历史教育的初衷。历史教育的首要功能固然是为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服务,但其能否成功推广并实现其教育目的,还取决于历史教科书在材料选取、叙事策略和历史观念上能否充分反映伊朗国家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认同需求。因此,如何构建和推广正确的、符合伊朗历史实际和社会各阶层需求的历史观念,寓伊朗文明传统中的“多”于伊朗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仍然是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根本性问题。

Abstract The Achaemenid-Aryan and the Shi' i-Islamic identities are two core components of the modern Ir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y respectively constitute the official ideology of the Pahlavi Dynasty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the post-Khomeini era, in order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Achaemenid-Aryan identity and the Shi' i-Islamic identity, Iranian history textbooks, while constructing a dual-line progressive civilization narrative system of ancient Persian and Islam, carefully selected the “external others” and “internal others” in Iranian history to explore the consistent national spiritual traits of resisting power, opposing autocracy and emphasizing justice shared by the pre-Islamic Iran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Shi' i-Islamic civilization, to bridge the tension of dual-identity through a coherent “resistance narrative”. Although this narrative has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internal rifts in Iranian national identity, contemporary Iranian history education still has not been able to completely shake of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views on civilization, national history and religious history, thereby reflecting the tortuous and long-term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ranian nation-state.

Keywords History Textbook Dual-Identity Resistance Narrative Nation-Building

(蒋真,教授;郭欣如,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西安,710127)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艾仁贵:《从文明遗产中寻求国家认同:考古发掘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5 期,第 47—49 页。

② Haggay Ram, “The Immemorial Iranian Nation? School Textbook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6, no. 1, pp. 83 – 85.